政治文化

辛西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

王开玺

[**摘要**] 1861 年 8 月，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措施。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慈禧与肃顺等人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程度上皆依恃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当时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使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这种正统皇权主义思想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

[**关键词**] 辛酉政变　臣权与君权　正统皇权思想　成功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2) 04 - 0049 - 08

The Xinyou Coup d'Etat and Orthodox Thinking on Imperial Power: A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Cixi's Coup

In August 1861, the Emperor Xianfeng arranged “the funeral affairs” on his deathbed. This arrangement created a balance of power, but also set the stage for the subsequent power struggle. The provision of the imperial seal institutionally ensured the preservation of imperial power and pre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Su Shun and others forcing the new child emperor to do their bidding, but it also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for Ci Xi to grasp the highest power of Qing court. The numerous victories that Ci Xi won over Su Shun, such as obtaining the title of queen mother, were a result of her ability to control the imperial seal. Many ministers、literati and officials, who held orthodox ideas of imperial power, expressed widespread doubts over the leg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u Shun and his supporters thereby assisting the child emperor. The orthodox idea of imperial power was the profoundly decisive reason that Ci Xi won victory in the coup. It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but also has influenced some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1861 年 11 月 2 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illegible]联合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关于慈禧等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原因，史学界大多归结为：肃顺等人的大意麻痹；慈禧、奕[illegible]的联合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全力支持；取得了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武力支持；利用朝野上下对肃顺集团的不满，控制了京师内外的舆论等等。以上各种说法，仅为历史过程中的表象或直接原因，似仍有进一步商榷探讨的必要。笔者以为，慈禧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是为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这一思想意识层

[**收稿日期**] 2002 - 4 - 10
[**作者简介**] 王开玺 (1949 —)，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5

面的原因，多年来为人们所忽视。

一、传统观点的缺憾

传统观点中的一个突出说法即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等的对外态度，较肃顺集团更具妥协色彩，因而博得了外国侵略者的好感与支持。有的学者断言，辛酉政变是“以英国为首的侵略者策动的”[1]，“是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干预下出现的”[2]，有的学者甚至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辛酉政变也是如此。”[3]其史料根据是，在咸丰帝弥留之际，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孙即曾鼓吹过“变更皇位”的“惊人问题”。英国人曾声称：“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造成的。”[4]政变后，英国驻华使臣卜鲁斯给英国外相的信函也明确声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5]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宝成关先生的质疑文章认为，上述史料，或“并未提供任何事实”，或“无丝毫证据”，纯属“推测之词”。[6]笔者完全赞同宝先生的观点，另有几点补充：第一，英国侵略者的上述说法，可以说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更乐于认可慈禧、奕䜣等人政变的既成事实。他们的不反对或支持态度，对慈禧、奕䜣发动政变或许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英国侵略者直接影响或参与了辛酉政变。第二，有同志引用毛泽东1941年1月的讲话，来证明辛酉政变时期清统治者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也是不恰当的。辛酉政变之时，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尚未完全结合起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尚在鄙夷地称外国人为夷人，对外国人疑惧颇深。此时如某人得到外国人的公开支持，那么他得到的决不是什么成功，而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中外公开勾结，是辛酉政变以后的事情。第三，英国人企图使恭亲王上台为帝的想法，是其不甚了解中国国情的主观臆想，根本无法实现。义和团运动后，列强亦曾设想变更中国皇统，终因无合适人选而放弃。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20世纪初，列强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变更中国的皇统，何论19世纪60年代。

另外两个传统说法，即慈禧、奕䜣发动政变成功，是因为得到了胜保、僧格林沁等人的武力支持，得到了对肃顺集团不满的其他官僚的支持。此说固然不错，但仅属表面。胜保、僧格林沁和其他官僚集团，为什么支持慈禧和奕䜣，而不支持肃顺等人？除肃顺等人曾伤及其某些既得利益外，是否还有其他层面的原因？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7]当时清廷各级官员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和“皮肤”，即是封建专制制度、正统的皇权思想。正是这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深层次原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慈禧、奕䜣等人的成功和肃顺等人的失败。

二、代子钤印，无异垂帘

史学家大多认为，咸丰帝对肃顺等人“信任久而益专”，“行在事一以委之”，[8]言听计从，以致肃顺竟敢向咸丰帝进言，实行除去那拉氏的“钩弋故事”。事实上，临终之际的咸丰帝对肃顺等人并不十分信任放心，他在如何防范权臣专擅，确保皇权、皇统不致旁落方面，办法虽不高明，但并不糊涂。

1861年8月22日子初三刻，咸丰帝神智较前清醒，实为回光返照。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请以朱笔遗诏。咸丰帝“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9]随后，咸丰帝崩逝。当日颁布遗诏二，一立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凭信。“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即慈安太后）用‘御赏’印，印起。上（嗣皇帝）用‘同道堂’印，印迄。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10]赞襄政务王大臣给内阁及各地方官员的咨文称：嗣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

后，由“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11]。

咸丰帝的“后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才具优长，对此，咸丰帝是心知肚明的。同时，兄弟二人曾因奕訢生母的封号及丧仪等问题发生龃龉不快，咸丰帝对恭亲王并不十分放心，“若托以后事，又恐‘将不利于孺子（小皇帝）’。”[12]故此宗支最近的奕訢被排除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这虽在情理之中，却又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使人们对咸丰帝遗诏的真实可信性产生严重的怀疑。

其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虽名为顾命大臣，但毕竟多是远支宗亲，终为人臣奴才，其职责仅是辅弼赞襄小皇帝执政，必须时刻遵守“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

其三，只有小皇帝及太后（慈安）才是皇权、皇统的真正代表与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慈安和皇帝钤印的规定，是咸丰帝对赞襄政务王大臣可能专擅弄权的防范措施。

其四，太后与皇帝的钤印规定，是为当时的权变之策，就其制度而言，是不完善的。按规定，载淳的生母那拉氏无权过问两颗印章的管理与使用，更无干预朝政的权力。但是，年仅六岁的载淳，处理国政、朝政之时，由其钤印“同道堂”印章，无任何集权揽政的实际意义。这就使慈禧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钤印“同道堂”印章的权力。

综上所述，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13]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大臣几个回合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皆依恃其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

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嫔妃于灵前奠酒，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

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黜陟刑赏”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懿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14]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除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外，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

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折……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15]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

9 月 10 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16]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

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

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17]

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18]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名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19]“浑蛋者”，并非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而是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

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銮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 不但即将临头，而且是必然的。

较量之四——曹、莽者流与孤儿寡母。

清廷决定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20]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譞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奏对之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21]等罪名。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䜣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22]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23]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1861年11月2日，奕䜣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䜣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䜣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䜣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24]另据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䜣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

无语”。奕䜣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25]遂束手被擒。

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恽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䜣，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26]

“辛酉政变”已经成功。由此可见，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27]

三、正统皇权思想不可低估

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一文中曾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其意思非常明确，即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28]正统皇权思想更是如此。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二千余年的因革损益，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最初，儒家也不过是提倡“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29]“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0]是一种相互维系的责任关系。嗣后，虽然有人抨击皇帝为“独夫”，“至死弗恤”[31]的暴君，也有人咒骂“帝王者皆贼也”，[32]但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反对皇帝即违反天命，并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提倡和推行“君为臣纲”等正统皇权思想，君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既然皇帝是天命的代表，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权者，君主所独裁也”。[33]董仲舒曾提倡说：“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34]，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节愚忠观念。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从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言行中亦可窥见一斑。

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听到炀帝为宇文化及所杀后，曾表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35]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失败后，张献忠的余部孙可望和李定国等竟认为，代表正统皇权的明王朝之德，“入人心久矣”，李自成在北京“称帝而不终”，“是天未厌明德也”，甚至表示将“反正扶明，洗去贼名”，奉明王朝之“正朔”，后又分别被南明永历政权封为景国公和康侯等。[36]这大概是不能仅以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暂时掩盖了阶级矛盾来加以解释的吧？

农民起义领袖尚且如此，作为封建皇帝臣子的各级官员更是如此，他们当然更明白封建皇帝之皮与其封建官僚之毛的依附关系。

有的同志说：“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在那里，两位皇太后及小皇帝均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如果那拉氏和奕䜣胆敢轻举妄动，一道圣旨诏告天下，他们便成了乱臣贼子，罪该当诛，何况又有顾命遗诏在手，可以自行废立，找个借口把小皇帝载淳废掉，也是轻而易举的事。”[37]这显然太过小视皇权思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了。“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38]正统皇权思想的传统更是如此。

“顾命”一词，渊源甚古。《尚书》中有《顾命》篇。《周书》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孔传释曰：“临终之命曰顾命。”顾命之事，最为人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当数刘备白帝城托孤故事。刘备嘱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诸葛亮当时叩头坚拒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39]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未想过或决然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咸丰帝临终之际遗诏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辅弼载淳，并未给其以自行废立的权力。且不论肃顺等人当时是否具有这种随意废立皇帝的能力，即使其有此“贼心”，也决无此“贼胆”。据溥雪斋先生回忆，奕䜣到达热河后，有人当着奕䜣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当时也只好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40]由此可见臣子无可奈何皇权之一斑。肃顺等人之所以能够掌握清廷大权，是因为其打着忠君和维护皇权的旗帜。没有慈禧、慈安太后钤印“御赏”和“同道堂”印章，罪诛太后及奕䜣的谕旨即不合法，何论罪诛？至于“找个借口将小皇帝载淳废掉”，更是肃顺等人所不敢想的。否则，被诛杀的决不仅是肃顺、载垣、端华本人，而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之祸。

正统皇权思想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

1861年11月7日，以载淳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这是政变后的论罪之词，自然不可视为论史之据。但在政局尚未明朗的政变之前，确有许多文武大臣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并公开挑战。

当时有人以清帝远支宗亲载垣、端华、肃顺等为清廷中的“贤党”，以近支宗亲奕䜣、奕譞等为“亲党”。清廷家法主张“亲亲尊贤”，而“亲亲”又在“尊贤”之上。有鉴于咸丰帝的临终遗命，并非其朱笔亲写，而是由肃顺等人“承写”，故而使得朝廷内外对此惊骇疑惑。

首先，清廷内的近支亲王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恭亲王奕䜣宗亲最近，又有与英法联军议和定难之功，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自然极为不满。其他近支亲王亦如是。肃顺等以“搁车”形式要挟慈禧事件发生后，慈禧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41]并受命回京召至恭王。《热河密札》亦称：“七先生（醇亲王）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惇亲王奕誴恐其语多有失，“喝止之”。[42]

其次，清廷内的元老重臣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如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慈铭表现尤为突出。他认为，在中外多事之秋，“嗣主深居于禁中”，如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代行皇权，使“诸臣秉笔于枢府”，必致“宫廷隔绝，上下相疑”。李慈铭的这种担心在当时的清廷官员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现今天子年幼，“孺子何知”，况且宫闱深重万里，所颁谕旨岂能仅以方寸印文（即“御赏”与“同道堂”印章）为凭据，“决为九重手定？”[43]

李慈铭等人认为，所谓肃顺等受顾命之托一事，是先帝病危之时仓猝间决定的，先帝的“审择所由，臣民未喻”，肃顺等人完全有可能是“藉地自矜……冒遗命以固政权。虽假王权，实由私意。”[44]况且“大行（咸丰帝）末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与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必使“中外骇异，谓非圣意”。其意在于力图从根本上否认肃顺等人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帝的皇权光环。[45]就连被目为肃顺党人的王闿运也曾认为“恭亲王宜当国”。[46]其意无非是为了拉上近支亲王奕䜣，使肃顺等人更具皇权代表的色彩，避免疏远皇亲、乘机揽权之嫌。

再次，清廷内掌握部分兵权的武将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僧格林沁公然违抗肃顺等人关于内外臣工于奏折内只准书写“皇上”，而不得书写“皇太后”字样的规定，在其奏折中故意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肃顺等人就此提出批评后，僧格林沁竟表示今后“仍不敢不如此缮写”。[47]

胜保上奏折直接向肃顺等人挑战说：“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肃顺等人竟以“承写”的谕旨为据，自任顾命大臣，“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现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

出自宸衷”。“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胜保提出，“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须由“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其所谓“正国体”、“顺人心”者，即将皇权牢牢掌握在与小皇帝最亲近、最能代表皇权的皇太后和亲皇叔手中，谨防皇权旁落权臣。胜保还特别要求清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公同阅看”，[48]其争取近支皇族支持的心理跃然纸上。

再其次，颇受肃顺等人信任倚重的汉族官僚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也对此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怀疑。他们认为胜保等陈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于近支亲王中择人辅政之举，“皆识时之至言”，甚至称颂慈禧罪诛肃顺等人“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的“英断”之见。[49]

正统皇权思想之深重影响，还可由肃顺等人一次败招中得到佐证。10月7日，尚在热河的肃顺等人“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他职，恳请清廷“酌量改派”他人。肃顺等人此举，或许是“意在彰其劳勋”，[50]但也可以理解为其表明将全心专意致力于辅弼政务，于其他事务不敢专擅专揽，以消除他人对自己的种种疑忌，是对至高无上皇权的一种妥协办法。

四、余 论

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就利用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辛酉政变”这样中外瞩目、惊心动魄的政局、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特别是慈禧太后专权47年的新局面，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辛酉政变”后，国内外许多人为政变的成功而高兴。薛福成曾称道说：“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51]时人皆以慈禧太后为皇权的代表，垂帘听政之举纯为向同治皇帝亲政过渡的“舍经用权”之计，由此而酿女主称制局面，也是当时的官僚士大夫所始料不及的。否则，人们或许会做出另一种政治人事选择。

就慈禧个人而言，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1869年7月，曾国藩与其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清廷政局时即曾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52]咸丰帝死后，实行的虽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权力机制，但慈禧无疑占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䜣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被曾国藩称为“极聪明”的恭亲王奕䜣，论血缘，为同治帝的亲皇叔；论权力，为清廷议政王；论爵位，为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尚且无可奈何于正统皇权的代表者慈禧，更何论端华、肃顺者流。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3]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即曾痛斥过这种所谓的正统皇权思想。他说：持正统论者不论是非曲直，亦不论其原来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在他看来，所谓“王”与“寇”并无明显差异，二者不过一步之遥。董卓、安禄山、吴三桂也好，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也罢，“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正所谓“成即为王，败即为寇”。[54]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不仅严重影响着当时各阶层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某些人无视天王洪秀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错误，及其对翼王石达开的疑忌与排斥，仍以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为思维核心，坚持“只许君不君，不许臣不臣”的“君臣大义”，批评石达开率军出走是不顾大局、分裂太平天国的史学

观点，不正是正统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对人们思想严重束缚的表现吗？

---

①黄逸峰、姜铎：《洋务运动总论》，《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②㊲方式光：《“祺祥政变”剖析》，《学术月刊》，1986年第2期。

③劳绍华：《试探辛酉政变的根源》，《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5期。

④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第4、5月号。

⑤《普鲁斯致罗素函》，转引自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页。

⑥宝成关：《辛酉政变起因辨——驳英国侵略者策动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

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7页。

⑧《清史稿》，第38册，总11700—11701页。

⑨⑩⑬⑱⑲㊷《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6页；第6页；第12页。

⑪⑯⑰⑳㊼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85页；第91—92页；第94页；第101—102页；第105页；第99—101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⑫恽宝惠：《清慈禧太后篡窃政权之经过》，北京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第235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⑭㉒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5页；第6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⑮邓之诚：《祺祥故事·序》，第2页。《旧闻零拾》，上。1939年邓氏五石斋精印本。

㉑㉓㉔㊿51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293页；第293页；第294页；第292页；第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㉕王[illegible]运：《祺祥故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26页。

㉖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4页；第6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㉗㊶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第256页；第24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㉘54王忍之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上册，第190—191页；第194—1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㉙《云梦秦简》李书，第140页。

㉚《论语．八佾》。

㉛方勺：《青溪寇轨》，退补斋刻本。

㉜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一，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

㉝《韩非子·显学》。

㉞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清乾隆辛亥年王氏刻本。

㉟刘[illegible]：《旧唐书·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㊱温睿临：《南疆逸史》，第405—40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㊳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㊴陈寿：《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五。

㊸㊹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第108页；第108页；辛集下第13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本。

㊻邓之诚：《祺祥故事·序》，第1页。《旧闻零拾》，上。

㊾《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影印本。

52汪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93页。